

GAODUAN
FANGTAN

高端访谈

袁振国 主编

——关于现代大学的思考
(第二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较经济地、合理地进行，而且比较容易。我个人的意见是，基础研究应该主要放在大学里面，应用研究可以放在科学院、企业、政府研究部门等机构。

《大学》：日本就是教育与科技统一体制，设立了文部科学省。

纪校长：日本是科教统一的，而中国是两条线。中国的科技、科研和教育体制分家，造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性障碍。

《大学》：如果按照您刚才讲的，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人才培养，那么是否表明科教分家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大学更看重人才培养。

纪校长：没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不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的。

《大学》：这样不就产生矛盾了吗？

纪校长：不矛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教学、科研交叉在一起的。比如说研究生培养，同时也是进行科学研究，两方面一定会集中体现出来。世界上的名牌大学中，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是导师和研究生一起做出来的。研究生不是大学生，研究生就是研究生，大学生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就是要搞研究的。当然，本科生教学也有研究性思维的培养，但真正搞科研的还是极少数的。到研究生阶段，应该全部进入研究状态。如果科研和教育两种体制、“两张皮”的状况得到改变，将会大大加快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一些世界一流大学，比如东京大学，就有上百个研究所都是挂在学校名下。有些人讲东京大学如何如何，非要跟东京大学比较，那好，能把中国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变成日本那样吗？所以，不顾国情，乱提要求，乱提口号，问题其实很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讲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不容易，因为力量过于分散，也就是说一些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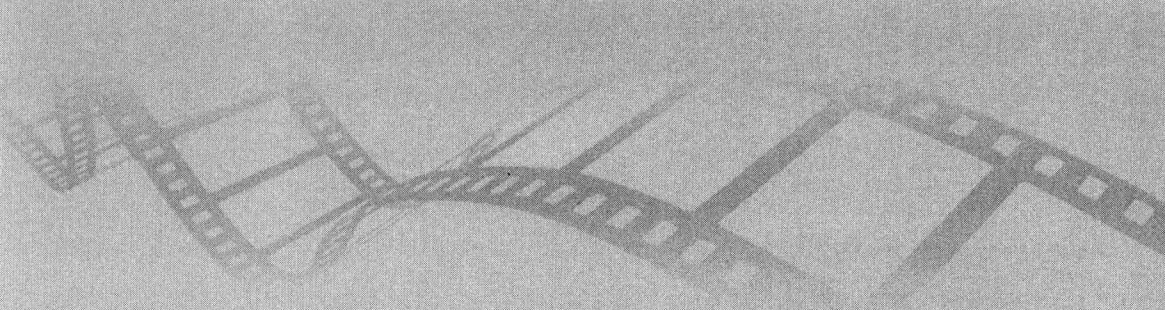
一样的，企业的研发部关注的是产品开发和技术应用。大学则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起更多的作用。国外的基础研究基本上都放在大学，跟企业的应用研究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当然，有些大学也可以多搞一些应用研究，但是研究型大学一定不会放下基础研究。

所以，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思想认识和政策环境、制度环境、育人环境，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职能，高水平、高质量人才培养是一定跟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把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理想信念灌输给学生。要让学生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为国家、为民族，为科学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的理想，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学生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世界一流大学中，一定要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这种理想信念，这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动科学发展，服务于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也为世界学术的繁荣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指标还要不要？要！但是绝对不能陷入工具主义的泥潭，不讲价值理性、价值导向。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是全面发展、整体提升的。首先是高扬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引领大学发展，就不可能建设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一两个学科一时勉强上去了，也一定会掉下来。

中国高等学校走到今天不容易，要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容易。如果没有困难，也就不需要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多么艰难了。建设一流大学，既有理念上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大学自身努力的问题、精神状态的问题。在一所学校里面，要



如何在同类大学中突显特色

——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



者。现在我们培养的人才也很多，遍布全国。例如，在西藏和新疆政法界都有许多我们的毕业生。在北京的法院系统，不少法院 1/3 以上的法官是法大的校友；北京的律师大约有 1/4，近四五千名是我们法大的毕业生。我们培养了这么多人才，今后出对国家和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才的机会肯定也会多一些。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现在不仅法学科研成果总量名列第一，而且也出产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在科研成果总量上，刚开始人大、武大都比我们法大多，但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抓科研，引导老师们不仅要搞好教学，也要搞好科学研究，效果就出来了。我们建议教师可以在外面适当地参与一些实务活动，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

我们现在也非常注意培养年轻的专家学者，学校在进入标准上也非常严格，要求德才兼备、热爱教育、关爱学生、崇尚学术，可以说是精挑细选，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入法大的，即便是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也很难进来。

《大学》：是否可以避开与其他高校比拼学科的多少，而通过开辟人才培养新途径等来体现优势呢？

黄校长：加强学科建设，并不是要与其他高校比拼学科的多少，而是要通过学科建设来构建自己的学科格局，强化自己的教师队伍，以便更好地培养优质人才，传承和发展学术，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因为优质人才的培养需要很丰富的课程设置，仅靠外聘教师来开设课程是很有局限的。如果没有这些学科，就没有自己的师资队伍，有些课程也开不出来。我们现在有文、史、哲的老师，他们除了把自己本专业教好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给全校学生上一些通识课，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另外，他们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师资队伍，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一起会使这个校园的文化更加多元一些，而不是局限于单一的法学领域，这对学生的成长肯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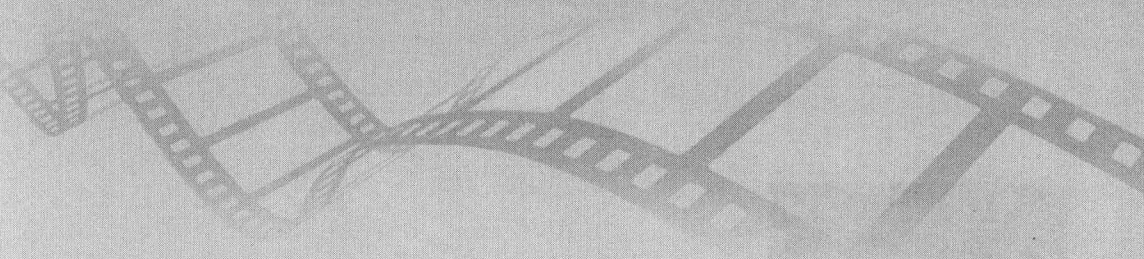


创新实践，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人才培养。

《大学》：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效果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

王校长：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面向区域协同创新，哈工大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合作，成立了黑龙江省工业技术研究院，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融入黑龙江省创新体系建设，集中装备制造、材料、电子信息、土木工程等领域的优质科研资源，与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改造、工业与信息化技术的融合，特别是与八大经济区建设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打造符合黑龙江区域特点的高水平的集技术研发、整合集成、转移与扩散的工业技术与支撑平台，形成“政产学研金介”结合的一体化协同创新联盟。

这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新模式，有力地服务了国民经济主战场。在多年服务航天的基础上，2010年哈工大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投入5亿元研究经费，结合国家重大任务需求，瞄准未来我国空天技术领域新的战略制高点，凝聚校企双方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力量进行协同创新，组织开展空天技术战略研究和系统论证，培育重大科技项目，在空天技术领域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发展基础理论，探索新概念、新技术和新方法，为全面构建航天科技工业新体系，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航天企业集团和世界一流大学，使我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转变提供持续的重要的科技支撑。研究院的成立，对校企双方是一次双赢的深度合作，是在航天领域第一个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作、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重大研发与应用平台。航天集团可以借此围绕空天科技领域持续稳定地开展重大基础性、前沿性技术探索和应用基础技术研究，实现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的紧密结合，提高企业集成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哈工大可以借此



拓展国际视野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

跟下围棋一样，只能是两个人水平差不多的时候，他才愿意邀请你，你也才愿意邀请他，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就是这个道理。

《大学》：合作办学是否依然是国际化的重要途径？

张校长：合作办学模式现在有很多。但我觉得合作办学的关键要看双方能否平等地开展合作交流。就是说，不能停留在单向输入的阶段，现在如“2+2”之类的做法，主要是中国学生到别的国家去访学或求学，别的国家的学者、学生相对较少地来我们国家访问或学习。当然，这样的好处是，至少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些平台，让部分学生接受国外的优质教育，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成为学校国际化的主流。

《大学》：那您认为应该怎样推进国际化呢？

张校长：我认为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加大投入，循序渐进，在推进国际化的过程中要牢记大学的使命。比如，为了探索培养中国石油工业需要的国际化人才，我们专门开设了全英文研究生国际班，全部采用英语教学，课程也是请很多国外的老师来讲课，大致1/3的课由我们学校的老师讲，2/3的课请国外的教师讲，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受到国外的文化，感受到差异。其实这个成本很高，如果不投入，培养国际化人才就更难实现。就是说，一定要看得远，有投入，才能见成效。现在中国石油工业海外发展很快，我们必须抢占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制高点。同时，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我们通过上述方式也吸引了不少国外留学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留学生。现在学校有5%的学生是国际学生，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80%的留学生都是学历生。我们的留学生多与其本国的石油公司有些关联，而那些公司又与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公司有合作关系，所以他们回国以后，不仅能够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还能为中国的石油企业做些事情，能为中国的石油企业牵线搭桥，



史，也帮他们解决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

第三，建立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规则。协同创新依靠的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协同作战。在合作的不同阶段，主体是不一样的。第一阶段是北交大为主，第二阶段是地铁运营公司，第三阶段是地铁建设公司。在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主体来负责，这意味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如果北交大自己独立进行这个研究，这个系统可能永远停留在实验室里。没有利益，企业为什么要和你合作？高校不能只看到被分掉的利益，更应该看到被分担的风险和优势互补。任何参与的企业，其实也承担着风险，也做着重要贡献。只有在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原则下，协同创新才能成为可能。

《大学》：协同创新是否意味着不仅要利益共享，更要风险共担？

宁校长：是的。实际上，城轨 CBTC 系统是非常典型的有较大风险的核心技术创新，它的成功有赖于政府部门、测试企业、运营公司等一系列单位和部门的支持。因为，创新是一项具有风险的活动，要有承受失败的心理准备，不少创新往往是以失败告终，但却给下一次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创新的风险存在于理论研究、实验、测试和应用等一系列的过程，每一个参与主体都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这就需要每一个参与的主体都有风险意识，都要敢于承担或分担风险，并善于科学有效降低风险。如果谁都不愿承担风险，技术就不可能取得突破。如果没有人使用，这套系统就永远放在实验室里，我们的核心技术就会永远受制于人。

《大学》：有风险分担机制吗？

宁校长：风险的分担是一个制度建设过程。对特殊装备研发、试验、制造和使用，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风险分担制度，不能让创新主体承担无限责任，否则就无人去从事这类创新了。通过这个项目的实践，我们正在思考如何合理建立这种机制。我们去医院看病，

都想找好大夫，但很少思考好大夫是如何产生的。好大夫是从实践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一套制度保障实习大夫的成长，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找实习大夫看病，那何来好大夫？所以，一定要建立制度，保障创新，保护创新。

《大学》：面对这样的风险与责任，协同创新是否更加考验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意识和心态以及国家或高校的研究氛围？

宁校长：是的。这么多年来，不管是看资料、开研讨会、听报告，还是实地考察、出国访问等场合，我从来没有放弃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交流，要与世界保持同步，知道这项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同时要思考，这项技术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没有切实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些判断，你做的研究就不是最前沿、最有用的。有了理论研究这个重要基础，才能去跟人家谈协同创新，不然什么科研积累都没有，协同从何谈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大学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调整好心态，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是高校进行协同创新的基础。

当然，创新过程具有一定的风险，不能要求所有的创新都成功，即使失败也能为我们积累数据，也是一种科研积累。北交大有多项创新计划，最后只有几项成功了，我认为这就很不错了。同时，还要善待那些不成功的项目，否则以后大家都不愿做这些事情。不能急功近利地只允许成功，不包容失败。所以，大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的管理需要营造一种良好的科研氛围和政策环境，让研究者脚踏实地地潜心研究。

其实，每个行业都知道自己行业最薄弱的研究在哪。我们国家很多领域的核心技术对国外具有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这一点，我们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是，怎么把这个认识转化为行动，考验着高校管理者的水平。科研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



在我们要推行协同创新，从事国家重大协同创新项目的教师和从事纯粹理论研究的教师评价方式要不一样，理论研究更看重 SCI 等期刊论文的数量和水平，但是从事协同创新的教师就不能用发表论文的方式来考核。所以，需要加强评价的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需要建立合理完善的评价制度保障不同学科领域教师的利益和积极性。

《大学》：前不久成立的“北京高科大学联盟”是否意味着行业型高校之间要进行协同创新？

宁校长：应该说有这样的考虑，但不是全部。“北京高科大学联盟”的筹建是欧洲行业大学的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国内外大学发展的背景不尽相同，应该说欧洲行业大学的行业特色已经淡化了，而我们现在恰恰还处在行业大学要凸显行业特色的发展阶段。巴黎高科联合的目的是壮大规模，因为这些行业大学规模都很小，一般是几千人的学校，以研究生为主，他们联合起来可以共享一些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和“巴黎高科”相比，我们联合的目的不是为了求规模。由于在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行业院校都与原来的行业行政脱钩，而脱钩之后得到的行业支持整体变少了。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行业性大学所起的作用是综合性大学无法代替的，办好行业特色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联合是为了解决一些行业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比如说行业面临安全和发展战略等共性问题。同时也为提高话语权，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成立了“北京高科大学联盟”。可以说，各自的发展需求促成了我们的联合，这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行业大学跟行业密切联系是一种自发的、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联合，跟过去行政性的联合不一样。



杜部长：在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高等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差距；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有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的要求有差距；高校自主办学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有差距等等。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还不够科学，要害在于质量不高。

《大学》：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杜部长：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从体制机制改革上找出路。我认为，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破解高等教育发展深层次矛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我想特别强调几个方面的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高考改革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高校组织模式创新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新的着力点，试点学院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有力抓手。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改革任务十分重要而紧迫，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尝试，从习惯思维和固有模式中走出来。改革要走小步，不停步，看准了，迈大步。

《大学》：目前，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在加强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教育方面，主要有哪些考虑？

杜部长：培养创新型人才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任务，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客观要求。培养创新人才，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逐步探索形成科学基础、实践能力、人文素养融合发展的，适应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的体制机制。这方面我们进行了一

系列探索。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 228 个高等教育项目中，有 60 多项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试点项目。在即将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提高质量的首要工作。目前重点在推进 4 项工作：一是在 19 所高校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核心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建立拔尖学生重点培养的体制机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二是在 193 所高校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启动卓越医生、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重点是推进高校与行业部门、科研院所和企业深度合作，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三是在 17 所高校推进“试点学院”改革，以创新人才培养体制为核心，以学院为基本实施单位，重点在招生制度、培养模式、管理方式、教师聘任四方面进行综合性改革，形成创新人才培养的机制和氛围。四是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着眼于解决研究生创新和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完善导师负责制，综合考虑师德、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来遴选、评价导师，在录取、资助等方面给予导师更多自主权。加强专业学位建设，突出职业能力训练，建立相对独立的培养、考核、评价和管理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任务，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来共同探索，共同推进。

《大学》：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学生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

杜部长：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是目前人才培养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我们今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从国内的实践和国外的经验看，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高校要把实践育人摆在重要位置。最近，我们会同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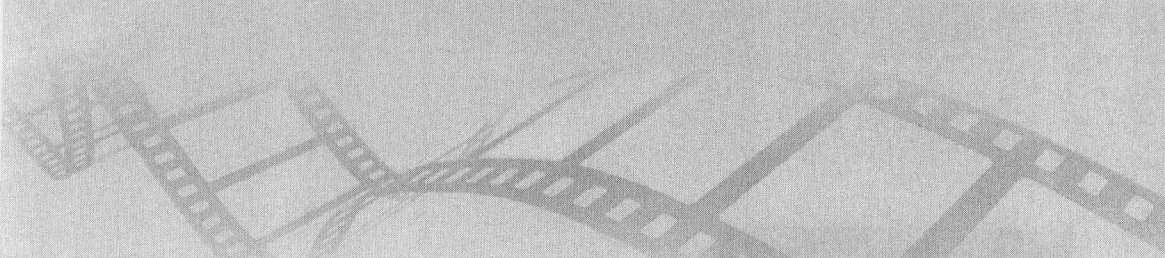
《大学》：您如何看待大学的行政化问题？

杜部长：《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我认为，“去行政化”，就是要把“如何办好一所大学”的问题交给学校，让学校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让教育家办学，让懂教育的人办教育，让书记和校长自主管理好学校，让教师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让学生全面健康地成长。“去行政化”，核心是要解决办学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为学生服务、为教师服务的问题。要让教师感受到尊重，让学生感受到关爱。校长要当学生的校长，成为师生的贴心人。

同时，还要特别明确几个概念：一是学术专家不等于教育家。学术专家是学科专业领域的骨干，教育家应该是讲政治、懂教育、会管理、肯投入的“大家”，需长期在教育一线工作，对教育事业无比热爱，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办学质量和特色得到社会公认。二是教授治学不等于教授治校。学术上的事主要是教授的事，教授的职责是教学、科研和育人；实施治校方略主要是书记、校长的事，书记、校长的职责是把学校办好、管好。三是去行政化不等于去行政管理，去行政化主要是去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防止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而不是去必要的行政管理。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原因就在于大学管理的弱化。四是去行政化不能动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去行政化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两码事，两者不能混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大学》：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那么，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我国高校组织模式的改革？

杜部长：当前，世界科技、教育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深度有机融合越来越成为提升创新能



如何认识大学的文化功能

——访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涂又光教授曾形象地将大学文化比喻为泡菜文化。他指出，泡菜的味道主要取决于由糖、盐、生姜、大蒜等构成的泡菜水的味道，而不仅是萝卜、白菜等本身的味道。这一论断可谓道出了大学文化的真谛。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大学就是通过文化来培养人、“创造人”的。大学的出现是为了继承文化、传播文化，进而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促进学生的知识化、文明化，塑造健全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文化育人体现了大学教育的本质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校园文化触摸到一所大学的精神和文化。校园文化是承载和表现大学文化的一种形式。校园文化既是大学文化的载体，也是它的核心。校园文化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如校歌、校训、校内的题字、文艺活动、讲座，等等。

《大学》：人们很容易把校园文化建设包括校园环境建设乃至学生社团活动等显性形式等同为校园文化的实质。应如何从大学文化功能的视角深入理解校园文化呢？

马书记：如前面所言，大学文化和校园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校园文化就是一种氛围，学生在校园文化中成长，对大学的记忆也由此而生。我认为，校园文化始终是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意义。比如，很多校友跟我讲，毕业多年，只要一听到《南湖秋月》这首歌，就会流泪，因为这首歌会让他想起当年在校园的林荫道散步的情景，想起桂花飘香的校园，想起曾经参加的各种校园活动。这就是校园文化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它在学生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大学文化烙印。我理解，大学校园文化中应该包含人文的、生态的、激情的元素。校园文化关键是要在校园里营造一种人文氛围，这里既是传承文明的人文校园，又是落英缤纷的生态校园，还是演绎青春的激情校园，